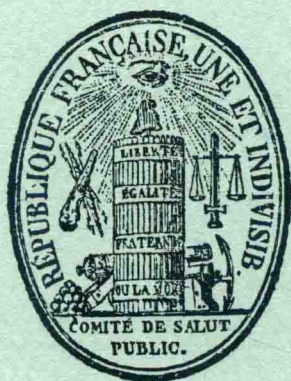


WILL & ARIEL DU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ROUSSEAU AND REVOLUTION



文明的故事

10

# 卢梭与大革命

-下-

[美] 威尔·杜兰特 阿里尔·杜兰特 著 台湾幼狮文化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WILL & ARIEL DU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

ROUSSEAU AND REVOLUTION

文明的故事

10

# 卢梭与大革命

-下-

[美] 威尔·杜兰特 阿里尔·杜兰特 著 台湾幼狮文化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卢梭与大革命 / ( 美 ) 威尔·杜兰特, ( 美 ) 阿里尔·杜兰特著;  
台湾幼狮文化译.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10

( 文明的故事 )

ISBN 978-7-5455-4133-5

I. ①卢… II. ①威… ②阿… ③台… III. ①文化史—欧洲—18世纪  
IV. ①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8 ) 第210496号

Rousseau and Revolution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67 by Will and Ariel Durant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on & Schuster, Inc.

著作权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8-490

## 卢梭与大革命

LUSUO YU DAGEMING

---

|      |                      |
|------|----------------------|
| 出品人  | 杨 政                  |
| 著 者  | [ 美 ] 威尔·杜兰特 阿里尔·杜兰特 |
| 责任编辑 | 杨永龙 聂俊珍              |
| 特邀编辑 | 张旖旎 孟志成              |
| 版权编辑 | 郭 淼 玉 叶              |
| 装帧设计 | 彭振威                  |
| 责任印制 | 葛红梅                  |

---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mailto:tiandicbs@vip.163.com)

---

|      |                        |
|------|------------------------|
|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版 次  | 2018年10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
| 成品尺寸 | 152mm×228mm 1/16       |
| 印 张  | 87.5                   |
| 字 数  | 1240千                  |
| 图 片  | 81幅                    |
| 定 价  | 228.00元(上下)            |
| 书 号  | ISBN 978-7-5455-4133-5 |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 028 ) 87734639 ( 总编室 )

## 第四章 | 波兰之劫

### ( 1715—1795 )

#### 波兰一览 ( 1715—1764 )

地理状况、种族、宗教和政治情形都是波兰先天的敌人。它的国土面积与法国相当，就 1715 年的疆界而言，西自奥得河起，东则一直延伸至斯摩棱斯克和基辅。然而，它没有高山、大河的天然疆界在东西两界作为国防上的屏障。其国名本源自“Pole”（意即田野或可耕地），而该字正是平原之意。它本土上可以说只有一个出海口，即但泽。另外的维斯图拉河出海处，因为太接近普鲁士，所以根本谈不上防卫。民族的构成也不单纯：占多数的波兰人有 650 万人之多（1715 年），还有德国人、犹太人、立陶宛人、俄罗斯人等少数民族，互相火拼，尤其是条顿人和斯拉夫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世仇。宗教上也不统一，罗马天主教教徒占多数，统治并压迫“异教徒”，包括新教徒、希腊正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本身也不团结。政治上更无团结力可言，因为最高权力掌握在完全由贵族组成的国会手中，而每位代表凭其自由否决权，可以取消其他代表的任何提案，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任何会期或任何一期国会中途夭折。国王由国会选举，同时一切遵照“约定”，这是他签了名作为选他的交换条件，其实即使有任何接

替王位和获得稳固的支持力的保证，他也实行不了长期政策。贵族要求毫无限制的立法权，因为他们希望他们能完全自由地管理其土地与奴隶。然而，自由的精义就是它本身也要受限制。它不受限制时，那也就等于被宣告死亡而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了。索别斯克之后的波兰史，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大事记。

几乎全国的土地都由封建体系下的农奴耕作，但农奴毫无上诉权。虽然地主有时显得非常仁慈，但他们通常更像是专制君主。农奴不但要交给他们要求的生产量，同时每周要在田庄内工作两三天，作为对主人恩德的报答。幸好，波兰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农民尚能糊口。但是，库克西形容他们“比我在旅游中见过的所有百姓还要穷困、贫贱和悲惨”。他们的主人只是低阶的贵族或乡绅（Szlachta）而已，他们还要向他们头上的几百位拥有或控制广大地区的大地主效忠，绅士阶级充任国家行政机构的大部分职位。理论上他们也控制国会，事实上，波兰的政治是由大地主或其家族控制的，他们以经济上的影响力或直接以贿赂手段，操纵绅士阶级彼此明争暗斗。

在波兰，家族仍然保留其超越国家的原始优先权，拉德兹维尔、普士克斯、卡扎托斯克斯三大豪门，其个别的家族情感紧密结合的程度，胜过任何国家民族的同属感所能产生的联结力。在此意义下，爱国心的表现成为对父亲的尊重，尤其是对族中长老的尊重。家族如同机构一样地刻板，因为那是经济生产和道德纪律的单位。因而，在此制度下从来没有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没有子孙分散在全国各地各自为政的情形。一般说来，孩子们都留在祖产的事业上，而只要其父仍在，就完全听命于父亲。家族因为权威的统一而飞黄腾达，缺少这种统一性的，则势力日减。所有家族的财富都由父辈们集中管制，很多家族由于其产物与出口的再投资利润，财富不断累积。结果，竟有一些家族在财富方面超过国王。18世纪，波兰20大家族每一家族每年在家务开支上，都要花上20万利维尔，权势赫赫的家族将自己的家当作宫廷，既有家臣、私有军队、无数的侍仆，又有类似皇家的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场。比如卡诺尔·拉德兹维尔，他的领地有半个爱尔兰那么大，在1789年一次4000名宾客的大宴中，就花了100万马克。

波兰最有名的家族是卡扎托斯克斯，家喻户晓，被直称为“大家族”。自15世纪以来，它一直占有王侯之位，同时与1384年至1572年统治波兰的乔治尔奥家族联婚。立陶宛副首相卡斯米尔兹·卡扎托斯克斯亲王与伊莎贝拉·莫施蒂因的婚姻（1741年），也使这一家族吸收了法国文化。她带给他3位有名的孩子，其一为弗雷德里·米西尔，后来成为立陶宛的首相；其二为亚历山大·奥古斯都，后来成为“红俄罗斯”有王权的亲王；其三为康斯坦蒂娅，她与斯坦尼斯拉斯一世结婚后，生有一子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这个孩子后来成为波兰历史上最富悲剧性的人物。

卡扎托斯克斯家族另一渐趋明显的特色是，随着财富的增加，其自由主义的思想逐渐衍生。他们很早以对俘虏行人道的待遇而闻名。当时一位人士说：“若我生而为奴隶，我愿意做亚历山大·奥古斯都·卡扎托斯克斯亲王的奴隶。”他们建学校给小孩子们就学，供给他们教科书，建教室、医院和模范乡村。他们召来老师与学者，在其位于普劳维（Pulawy）的田庄与别墅里，为国家教导出生于任何阶级的有为青年。政治上，他们极力反对自由否决权的行使，因为他们主张建立有效率的政府。但是，许多家族反对他们，因为他们认为否决权是他们防止君主集权专制的唯一方法。其中最强硬的反对派是普土克斯家族，这一家族的领导人物弗里希·波托茨基侯爵，在乌克兰有300万英亩的领地，他巡视时，可以从任一方向行30英里，而不出其领域。

16世纪，工业与商业曾使波兰国家壮大，城镇繁荣，然而地主与受地主摆布的国会两者的敌视，导致其发展停滞不前。很多城市恰好坐落在封侯的私有领地内，而这些封侯力赞农业反对工业，因为他们唯恐独立的中产阶级会因之兴起。此外，庄园内的农奴手工业的竞争，使城镇的工业受挫。安东尼·波托茨基于1744年写道：“城市荒

芜得很，我们只要一望即知，除了华沙一地外，全国第一大的城镇大概只有盗匪巢穴一般的规模而已。”利沃夫（Lvov）的街道杂草丛生，有些广场已成旷野。克拉科昔日为欧洲伟大的文化中心之一，沦为只剩 9000 居民的寂寞小城，显赫一时的大学，也只剩下 600 个学生而已。

城市的荒废部分归因于叶卡捷琳娜的再度征服。许多被驱逐的新教徒以前都是商人和工匠人；除了波兰西部（那里无数日耳曼人留了下来），波兰新教人口的锐减使波兰土地尽归地主所有，这些地主若不是罗马天主教徒，就是居于东方的东正教徒或唯一神教派教徒（承认教宗的最高权威，但仍保留其东正教仪式的教徒）。占全国总人口 8% 的异教徒包括新教徒、希腊正教徒和犹太教徒，被排除在政府公职与议会之外。所有对他们的诉讼都由天主教徒组成的法庭判决。宗教仇视已达到顶点。1724 年，在多由新教徒居住的地区托伦城，民众因为愤懑一个耶稣会学生的行为，而污辱圣体，践踏圣母像。9 个滋事者被判处死刑。波兰的新教徒于是向南部的普鲁士求助，希腊正教教徒则向东方的俄国求援。俄普两国都伸出援手，因此步入入侵与瓜分波兰之途。

波兰人的德行在桌上宛如德国人，在床上则一如法国人。农民因需要照顾其土地和妻子，所以长久习惯于一夫一妻制。但在首都，这一制度实难以维持，因为女人既美又富“诱惑的仪态”，而她们又不许她们的良好教育来收敛她们的魅力。据说，华沙的女人在性生活方面的放纵，堪与巴黎女人相比。波尼托夫斯基向我们保证过他到 22 岁时仍是处男，但他又补充说明，有这样的操守在他那个阶层里实属例外。酗酒不分阶级，普遍流行。在农民中，它可带来暂时的遗忘，忘掉贫穷、艰苦与寒冷。在贵族中，则可安慰他们的孤独与烦恼。所有阶级的男士都视酗酒为一种成就而非罪恶。潘·库玛西泽乌斯克能够一次饮尽一大桶香槟，而面不改色、神志清醒，这使他深以为荣。波尼托夫斯基更被警告说，除非他一周醉酒两次，否则将失去民心。

好客的风气全国盛行，但好客程度的高低全看被款待客人的酒量而定，有时，竟需以一大片土地或以一个城镇作抵押以备盛宴之需。

受过教育的波兰人，更以其服饰来点缀周围的景观。农民在夏天，随便穿着以粗亚麻做的衬衫与膝裤，既无袜子又无鞋子；在冬天，则裹着厚厚的衣服，从不讲究颜色，也没有时间修饰。为数 72.5 万人的绅士阶级则不然。他们脚穿马靴，头顶羽帽，身着丝制或绣花边的彩色袍子，腰际系着一条宽大有图案而且色彩鲜艳的织带。这一身神气十足的民族服饰是立陶宛人在乌克兰与土耳其人接触后而引进的打扮。这也可代表波兰人与土耳其人为对抗奥地利或俄国而行的临时结合，它也许表现出波兰人的行为举止与性格带有某种亚洲的风味。

具有文化传统的波兰在 1697 年至 1763 年，却因其萨克森诸王对斯拉夫文学与艺术的不关心和两次蹂躏全国的大战，而毫无进步。天主教会不但是首要的艺术赞助人，而且也是教育的教导者和知识与文学的主要来源。它处心积虑地将波兰带到西方的科学与哲学运动的洪流之外；不过，在这一范围内，它也推广了知识，教化了民众。基辅主教约瑟夫·扎鲁斯克在华沙替一个历史悠久博大的图书馆收集了 20 万册的书卷，1748 年，他将该馆开放给大众使用，并送给国家。而他自己生活俭朴，在力保波兰独立的战争中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促使年轻而热切的教士斯坦尼斯拉斯·卡纳尔斯克改学历史与法律的，也正是这位基辅主教。卡纳尔斯克编纂的从卡西米尔大帝到他那个时代的波兰法典，在 1732 年出版了四卷中的第一卷。对于他而言，这些和其他一些研究，显示出波兰很可悲地漂浮在文艺复兴的潮流之外。他深信，若要再生，必须从上层做起，因此他在华沙建立一所贵族学院（1740 年），家世上等的青年可在那里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不仅学数学、古典语言与文学（耶稣会教士在这方面的教育是颇有成果的），而且研习自然科学与现代语言。这真是值得称赞的创举，因为他既无财源，又无教科书，师资与学生俱缺，然而在 15 年的辛劳耕耘后，贵族学院成为一所有名望而为人赞誉的学校，更成

为波尼托夫斯基执政期间文化兴盛的源泉，也是1791年开明宪法诞生的主力。他呼吁改革波兰语言，剔除拉丁字句和华而不实的修辞。但全国都表示反对，仍旧照学传统语言不误。卡纳尔斯克于1760年至1763年出版了波兰18世纪最重要的政治论著，标志着其事业与声名达到最顶峰。该论著虽称为《论辩论的有效行使》（*On the Effective Conduct of Debates*），表面上看来毫无政治色彩，其实是对自由否决权的口诛笔伐。对否决权虽然另有许许多多的抗议，但1764年后，国会还是被自由否决权瓦解了。波尼亚托夫斯基改革的波兰宪政是由于得到卡纳尔斯克的助力而开始的。

在波兰逐渐苏醒并重见光明之前，它一直要在萨克森王的统治下，痛苦地度过67年的混乱、屈辱和败亡的苦痛岁月。

## 萨克森诸王（1697—1763）

波兰国会通过提案，将伟大的索别斯基之子的波兰王冠，交给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都。这位选帝侯因与天主教和解，一夜之间成为波兰王（强者）奥古斯都二世。瑞典的查理十二被斯坦尼斯拉斯一世取而代之（1704年），查理在波尔塔瓦被打败（1709年），而奥古斯都重得其王位。奥古斯都在18世纪的诸君王中，享有最少的立法权，但享有王室所有的性生活特权。由于他没有能力治理波兰，他将他的爱人送回萨克森美化德累斯顿，然后沉溺于啤酒中，在女人身上消耗他的生命力，而这些女人中只有一个是波兰美人。在他执政晚年，他打算将波兰瓜分给奥地利、普鲁士和萨克森三国，但他在实现这一罪恶前就死了（1733年2月1日）。他在其临终的床上说：“我的一生真是恶贯满盈。”这真是肺腑之言。

在选举国王的会议召开期间，法国公使利用银弹攻势，赢得议员和官员们关于恢复斯坦尼斯拉斯王位的保证。自被贬之日起，斯坦尼斯拉斯一世就在阿尔萨斯静候。1725年，他女儿玛丽和法王路易

十五结婚，成为法国皇后。因此，路易希望他岳父复位，而执行法国联合普、土两国以围堵奥地利的政策。但是，俄国政府唯恐这样一来会削弱俄国对抗土、普那种势难避免冲突的力量，也运送了大批卢布到华沙设法阻止法国的预谋。结果，利维尔压过卢布。1733年9月10日，斯坦尼斯拉斯成为波兰王。

但是一群少数派拒不承认该次选举，于是他们拉拢俄国，当时俄国军队已进至维斯图拉河，而且宣布萨克森选帝侯为波兰王奥古斯都三世（10月6日）。由此兴起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俄国首次决定性地干涉波兰事务。斯坦尼斯拉斯期盼有一支波兰军队护卫他，但除了纸上所载的外，看不见真的一兵一卒。他逃到但泽，乞求法国援助。法国政府当时由弗勒里大主教主政，而他不想与遥远的俄国作战，因此只派一支2400人的军队前往。对峙的结果，1.2万名俄军自然以量取胜。斯坦尼斯拉斯逃离但泽，退隐洛林。1736年1月，他签了退位书。7月，奥古斯都三世成为波兰王。

但是，他治理这个混乱不堪的君宪国家，比斯坦尼斯拉斯更加不适合。一度，他与卡扎托斯克斯合作，欲制止自由否决权的行使。波托茨基却不时地动用自由否决权来保有该制。奥古斯都终于放弃努力，而逍遥在德累斯顿，很少回波兰。贪污贿赂不但横行如常，甚至更加恶化。国王无法改善，只好与它合流，于是他也将官职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大地主控有军队与法庭，他们直接与外国强权谈判，而得其资助。法、奥、普、俄四国展开竞争，希望能从这即刻就要瓦解的国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

在奥古斯都临终与死后（1763年10月5日死亡）的一段时间，提名其后继者的竞赛，花样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外交手段竞相登场，也有“战争边缘”的运用。波托茨基号召建立一支10万人的常备军，以保护波兰免受外强的宰割。卡扎托斯克斯家族则退到俄国的荫底下，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妥协。俄国声称有波兰境内占少数的希腊正教徒的保护权，并追溯至800年前圣弗拉基米尔（St. Vladimir，约

956—1015 年) 时代, 东波兰省是从俄国手中被夺走的。法国则赞同奥古斯都三世之子承继王位, 因为若俄国控有波兰, 整个法国对东方的外交政策都要失败。腓特烈大帝因刚结束对法奥的 7 年艰苦战争, 需要得到助他逃过灾难的叶卡捷琳娜的友谊。因此, 他同意支持她的波兰王位候选人, 同时与她签了条约 (1764 年 4 月 11 日), 秘密地约定反对任何对瑞典或波兰宪政的改变, 否则王权的增大会导致这两者或其中之一危险的扩大, 他们提议要以自由之名来制止混乱。卡扎托斯克斯之所以为叶卡捷琳娜的绥靖劝服, 是因为她保证在情势恢复稳定后, 支持他革除自由否决权, 同时, 她要选定受他们家族保护者之一, 即他们的家臣为王位候选人。1764 年 9 月 7 日, 在卢布的攻势与 3 里外的俄军逼近之下, 国会一致通过选定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为王。

## 波尼亚托夫斯基

他生而为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 克拉科总督, 后于 1732 年 1 月 17 日投效卡扎托斯克斯家族。他告诉若弗兰夫人说: “我在极其严厉的教养中长大, 在今日你们找不到像我母亲那一类型的女人, 我父亲则仅以他本身为典范来教诲我。” 年方十六, 他即开始出国游历。1753 年, 他的外貌、风度和年轻深深地令若弗兰夫人为之迷醉, 也吸引了她整个沙龙的人士, 他几乎风靡全巴黎。几年之后, 他也跟着时尚, 写了一段自画自剖的文章, 其中所述与真实情形完全符合:

若我再高一英寸, 若我的鼻子稍微不那么又勾又直, 我的嘴再稍微小一点, 则我对我的外貌身段就完全满意了……虽有这些瑕疵, 我相信我的面部是高贵而富有表情的, 我的外形是出众的……我的近视常令我看来有点笨拙, 但这种感觉只是片刻的。的确, 我容易触怒别人, 因为我太走相反的极端, 也就是行径太

过高傲。美好的教育使我能够弥补我心智和身体上的缺陷，因此很多人对我的期望，比我能做到的还多。我的机智使我参加任何谈话，但总是无法持久和太过频繁。然而，我生性具有的同情心与友爱心总是一大助力。我天生对艺术有癖好……但是我的惰性令我无法深入艺术与科学。我不是做得太过分就是全然不做，我对事物的判断力不错……但是我特别需要好的建议，来帮我实现我自己的任何计划。我易受感动，但常为悲伤而较少为快乐所动。我很快就会懊恼……我喜爱时，我喜爱得极其狂热……我不报复别人。虽然在激动的片刻之间，我很想报复敌人，但我从未将这种意愿实施。因为同情心总是及时介入。

观察自己、表达自己如此得当，正表示波尼亚托夫斯基是生而为思考与写作，而非为计划与施行的人。他遇见过孟德斯鸠，读过伏尔泰的作品。他有法国社会那种心智上的优雅与细腻之风，并带有相当程度卢梭表现出的那种感情。他对女人很敏感，每每觉得她们给予他的，在精神或肉体上，都是无价的。曾经有过谣传说，他在巴黎负债累累，而后因之被捕，但在被监禁一小时后获释，因为若弗兰夫人替他偿还了10万利维尔的债务。

在巴黎过了5个月、学会了英语之后，他到英国去。他参观了好几次国会的会议，一心想要以孟德斯鸠描述的英国情形来改造波兰的情势。旅游结束回国后（1754年），他被任命为立陶宛的高级总管。一年后，他陪同查理·威廉亲王前往俄国，此行结果令人颇为满意。1756年回国，1757年以波兰大使的名义再度前往圣彼得堡。后因参与1758年欲图推翻伊丽莎白的阴谋，被迫即刻离开俄境。叶卡捷琳娜那时的确对他的离去感到悲痛，但后来在支持他为波兰王时，已不是因为她仍喜爱他，而是因为（据她的说法）他比起别的候选人来力量最小，因此会更为感激她的支持。至于他本人，则从未从兴奋而难以忘怀的短暂结合中清醒过来。他回忆中的叶卡捷琳娜是心肠尚未被

权力硬化的女人，他对她的一股迷恋即使在她利用他作为统治的工具时仍然存在。

在他被选为王时，他告诉若弗兰夫人：

我亲爱的妈妈：自从前天起，如此称呼你似乎是我更大的荣幸（他的亲生母亲现已死）。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没有过一次选举如此平静、如此一致……王国所有的尊贵夫人都到了，她们居于一大群的贵族之间……被所有的男士与女士的声音欢呼着时，我有一种满足感……但你为何不在场呢？你应该提名你的儿子的。

从这封信我们可“看出”他的“母亲”后来步上坎坷的欧洲大路，来造访她在华沙皇宫的“儿子”（1766年）了。她对法国与波兰文明的差距，没有一点实际的概念，因而她希望他能在一年内将落后一个世纪的波兰大肆整顿赶上他国。但她的这个建议带给他诸多麻烦，因为她使波尼亚托夫斯基紧张地表现才能，尽量地尽儿子应有的孝心。她回去时，虽然他以一番好话和用钻石镶嵌的自己的画像送给她、安慰她，其实在内心里觉得松了一口气。回国之后，她对她的爱趋于狂热，她从维也纳写给他的信中，肯定她对她的“感情是我生命中不可少的东西”。

波尼亚托夫斯基尽全力而为。第一年，他对政府上下的大小事务尽忠职守。他日日参与他的大臣们的议事，并工作至深夜，对任何问题了如指掌。他成功地施行了几项措施，训练出一批才干超群、完美无缺的文官。他使自己尽量地平易近人，以和蔼可亲而不以其对改革的热心来吸引人，但是他这一股精神被他对叶卡捷琳娜甚至对俄军的依赖感减损、冲淡。这些俄军是她派留在波兰境内，以保证他的安全并令他服从的。她的大使奥托·斯达克伯格伯爵监视他，以免他忘了后台老板俄国。

他受到远近各处的敌人的包围。当时，波兰的权贵分成两派：一派以波托茨基家族为首，要求在改革施行之前独立，同时希望保持贵族的强盛，以牵制王权；另一派以卡扎托斯克斯家族为首，主张先行改革，他们认为当时波兰的混乱情势，国力太弱，无法摆脱俄国的保护。卡扎托斯克斯家族对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支持犹豫不定，因为他们对他的放纵奢侈和眷恋女人感到十分悲痛。国会准他每年花费 220 万泰勒，1786 年提高到 614.3 万基尔德——后者约等于政府年收入的 1/3。他的花费比这还多，他从国内和海外银行到处借钱。国家曾两度偿还他的债务。然而，1790 年他仍负债 1150 万基尔德。他和叶卡捷琳娜一样，想以大兴土木作为他执政的永久纪念。他自己和他的仆从来来回回地在两处富贵华丽的宫殿中过日子。他耽于昂贵的享乐，他滥施赠礼给艺术家、作家和女人。

他个人的魅力也让他有所付出。继位时年仅 32 岁，潇洒而有教养，大方而仍未婚，于是吸引了渴望得他青睐和他财源的大批美女。一些无法同他结婚的女人，也都乐意与他同床，而一些巴黎来的女演员同样欲得国王宠幸。卡扎托斯克斯家族抗议。他承认过错，但不改恶习。最后，一位女郎名叫帕尼·格拉伯斯卡终使他走向圣堂，秘密地结了婚。此后，他的性生活备受监督，因而较有时间参与政事、文学和艺术。

他本人对艺术家和当时作家的作品与生活非常感兴趣。如同叶卡捷琳娜一样，他收集绘画、雕像和书本，建了一座艺术陈列室和图书馆。在图书馆内，给了伏尔泰崇高的尊荣。他替当地的艺术家找事做，也从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请来一些艺术家。皮拉内西和卡萨诺瓦两人不能来，但他们在意大利替他做了很多作品。他将王宫的一部分改为艺术学校，同时提供一大笔资金，使有潜力的年轻艺术家能到外国进修。他在华沙附近建了一个瓷器厂，其产品优良，可与梅森和塞夫尔的产品媲美。他鼓励富有的波兰人——如阿达姆·卡扎托斯克斯、伊丽莎白·鲁勃米斯卡、海伦·雷得兹维尔——收集艺术品，聘

雇艺术家，并重新建造和装饰其华丽的居所，以新古典主义的风格来取代萨克森时代的洛可可式样。但他本人喜爱古典与巴洛克两种风味的调和。达莫纳克·莫里尼就以这种风格来设计波兰郊区的拉兹克宫。此外，外国画家也在训练一批新生的波兰年轻艺术家，这批人在波兰失去自由后也都成熟了。

腓特烈大帝在波兰自身的改革过程中设下的障碍，是波兰走向灾难的第一步。到目前为止（1767年），叶卡捷琳娜似乎仍然不愿瓦解这个显然一切已受俄国影响的波兰。瓜分会扩大普鲁士的领域，这比一个听命于斯拉夫的波兰，更能构成俄国参与西欧事务与文化过程的重大障碍。她对能要求波兰给予非国教教徒百姓充分的民权，已感到满足。然而，腓特烈大帝的要求不仅止于此。他永不认为西普鲁士这一大多数居民皆为日耳曼人和新教徒的地区，应该归波兰人和天主教徒统治。因此，瓜分某些部分的波兰领土是他永难忘怀的目标。波兰本身所生的任何力量，无论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都会阻挠这一目标的达成。因此，他在波兰的代理人赞同自由否决制度的维持，反对波兰国家军队的组成，而对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也表示欢迎，因为这为其入侵提供借口。

在这个问题上，罗马天主教教士阶级的不宽容态度，与腓特烈大帝的计划恰恰不谋而合。它反对任何给予异教徒民权的措施。在白俄罗斯——当时是波兰国土的一部分，包括明斯克一带，罗马天主教当局从希腊正教会手中，接收了200所教堂，而将其交给唯一神教派教徒。东正教社区则不被获准修补他们破旧的教堂，也不准翻新或再建新教堂。波兰的孩子们从父母手中被抱走，在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养下长大，以服从其权威，这种情形更是很普遍。东正教教士百般受到刻薄的刁难，有些甚至被处死。波尼亚托夫斯基虽然赞同宗教宽容，但是他明白国会会反对承认非天主教徒的国会代表权的任何措施；同时，一旦有必要的话，他们会使用武力。而他也认为这一提议务必暂缓实施，至少等到自由否决权部分地被限制时，他

推行计划的力量才能加强。腓特烈与叶卡捷琳娜两人都回答波兰说，他们除要求他们各自在波兰境内的少数教派教徒能受到赐惠外，对波兰是别无所求的。普、俄、丹麦与英国对1766年10月和11月开会的波兰国会，提出了请愿书，要求他们在波兰境内的相同信仰者，能够享有充分的民权。

然而，代表们听完能言善辩的克拉科主教卡杰坦·索蒂克慷慨激烈的演说后，群情激愤，不但要求驳回请愿书，而且要求处死他们在波兰国内的支持者，因为他们是波兰和上帝的叛徒。一位代表企图替请愿书辩护，但备受攻击，险些没命。波尼亚托夫斯基为了使激动的国会冷静下来，发行一本小册子，名为《一位好市民的深虑》(*Considerations of a Good Citizen*)，呼吁全波兰人团结一致，并警告人民，分裂只会招来外侮。同时，他要求波兰驻圣彼得堡大使力劝俄国脱离请愿诸国的联盟。他写道：“若这种情况持续不变，那么结果必定是一个对非国教教徒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及带给我一次拉维立克(Ravillac，暗杀之意)的大成果……女皇会使我这件王服变成复仇之袍。我将不得不在放弃她的友谊和与国家为敌两者之间做一抉择。”叶卡捷琳娜通过她在华沙的大使尼克莱·列普宁，如此回答他：“我想不通何以一个国君只因支持合理正义的请求，就幻想自己成为国家的叛徒。”由于空间上的距离与教育上的不同背景，她实在觉察不出波兰人那股高昂情绪与骄傲造成的燎原之势。一群新教徒贵族在桑恩城组成一个联盟，而卡扎托斯克斯一派人士在拉多姆组联盟时，叶卡捷琳娜嘱咐列普宁告诉他们俄国会出面保护。以这个借口，俄国陈兵八万于波兰国界，一些更已进入华沙。

国会于1767年10月复会。泽卢斯克和索蒂克两位主教鼓励代表们坚定立场，反对任何宪政的改变。列普宁越过波尼亚托夫斯基，以侮辱女皇为名逮捕了主教与两位俗人，将他们送到莫斯科西南90英里处的卡卢加(Kaluga)。国会抗议，列普宁警告道，若他们进一步反对，他将送40个而非4个代表出境。1768年2月24日，国会终于

对战争的威胁低头，同时与俄签约，接受叶卡捷琳娜的全部条件：宗教信仰的完全自由，非国教徒任国会代表与公职的资格；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之间的诉讼，要由混合法庭审判。国会、叶卡捷琳娜和腓特烈对该约有关自由否决权除一些经济上的立法外仍然保留的安排，感到非常满意。国会谦逊地接受叶卡捷琳娜为新宪政的保护人。对此，她保证只要这种和解关系持续不变，波兰的国家领土必然完整，她对她不仅给予波兰人超过英国人享有的宗教自由，同时阻止了腓特烈瓜分的计划，感到非常欣慰与满意。波尼亚托夫斯基受到哲学家的恭贺，人民却指责他。

## 第一次瓜分（1768—1772）

波兰的爱国志士与教士们同意腓特烈的看法，即不接受这一情况的安排。罗马天主教教士强烈地指责波兰沦为俄国异教徒的附庸。卡米内克区的主教阿达姆·克拉辛斯基和约瑟夫·普拉斯克（即为美国独立奋斗的卡西米·普拉斯克的父亲），在各地讲道和散发各种小册子，试图唤起波兰人保护他们的政治自由与宗教独裁。在国会向列普宁屈服后的一周内，一群波兰人在波属乌克兰的第聂伯河上的小镇巴尔城，组成巴尔联盟（1768年2月29日）。该联盟在财政上的支持者都是对叶卡捷琳娜与国王深怀怨恨的大地主。腓特烈对他的党羽原本的称呼为“白痴的群众”，现在这些群众心中燃烧着熊熊烈火，为唯一真正的信仰义愤填膺。这股激情更由诗人以沉重的哀婉语调道出，他们痛感波兰所受的奇耻大辱和国王的“叛离”。于是武器与资金纷纷从土耳其和奥地利送到爱国志士手中，达姆瑞兹更从法国来到此地将民众组成战斗团体。一心一意想恢复萨克森王朝的波兰人也加入这一运动，于是这一运动在短时间内就蔓延到全国。列普宁向叶卡捷琳娜报告，“全波兰烈火将烧”。波尼亚托夫斯基想加入这一联盟，但联盟里的死硬分子吓走了他，他们警告他，即使不处死他，